

世界

# 漢語 教育史研究

主編  
李向玉  
張西平  
趙永新



# 世界漢語教育史研究

第一屆世界漢語教育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主編

李向玉 張西平 趙永新

澳門理工學院

MACAO POLYTECHNIC INSTITUTE

二〇〇五年七月

書名：世界漢語教育史研究  
第一屆世界漢語教育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主編：李向玉 張西平 趙永新  
出版：澳門理工學院  
校對：陳美絲  
封面設計：梁立華  
印數：800 冊  
版次：第一版  
電話：(853) 578722  
傳真：(853)526535  
電郵地址：[eslt@ipm.edu.mo](mailto:eslt@ipm.edu.mo)  
網址：[www.ipm.edu.mo](http://www.ipm.edu.mo)  
排版：澳門理工學院  
印刷：華輝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澳門漁翁街南豐工業大廈 82-86 號  
ISBN 99937-33-88-1  
出版日期：2005 年 7 月

第一屆世界漢語教育史國際學術研討會  
暨世界漢語教育史研究學會成立大會  
論文集編輯委員會

顧 問：崔世安 任繼愈 王路江 曲德林  
陳乃芳 李學勤 李鵬翥 李海績

主 編：李向玉 張西平 趙永新

編委會：李向玉 張西平 趙永新 崔維孝  
柳若梅 徐文堪 魯健驥 李 開  
許光華 崔明芬 賴少英

## 序言

# 簡論世界漢語教育史的研究物件和方法

世界汉语教育史的研究日益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在澳门所召开的第一届“世界汉语教育史国际研讨会”是这一研究领域的重大学术进展。但许多学者从不同的研究方向汇集到这个研究领域，由于学科的背景的差异，从而在研究方法和对汉语教育史研究物件的理解上也有著不同的角度。为进一步推动这一方向的研究，明确世界汉语教育史的研究物件和方法是十分必要的。

### 世界汉语教育史的研究物件

世界汉语教育史就是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育在世界范围内所发生的的历史过程。这一定义已经大略的确定了世界汉语教育史的研究物件的基本内容。

把汉语作为目的语进行学习和教育有著悠久的历史，鲁健骥先生最早明确提出这个问题，他说：“有史有论，是一个学科存在的必不可少的条件。近二十年来，对外汉语教学的科学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可以说在‘论’的方面，有了一定的基础，在‘史’的方面，显得十分不足。到目前为止，还只有一些很零散的记述。因此，我们应该改变这种状况，尽快地开展起来对外汉语教学历史的研究”<sup>1</sup>。毫无疑问对外汉语教育史是世界汉语教育史的最主要的内容，但并不是唯一的内容，我理解世界汉语教育史的研究应该有以下六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对外汉语教育史。汉语在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传播有著悠久的历史，汉语的对外教育始终是中国历代王朝的国家政策，作为语言教学，这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给我们研究对外汉语教学留下了及其丰富的经验。如董明先生所说：“闹清中外古人汉语教学的内容、特点及方式、方法，寻求其中有规律的东西，总结其经验教训，继承其优秀传统，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以便探索出一条真正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文化底蕴、符合汉语汉字特点的对外汉语教学之路，搞好今天的对外汉语教学，促进学科的发展、建设，使之日臻完善、成熟。”<sup>2</sup>这个历史应从古代一直到当代，董明先生的研究有开创之功，但如果作为学科史研究，这只是一个开端，应进一步做更为深入地断代史和个案史的研究。收入本论文集中的施光亨先生的长文是对对外汉语教学史的一个系统论述，给我们展示了对外汉语教育史的丰富内容；鲁健骥先生的《践约传——19世纪中叶中国人编写的汉语简易读物》，鲁宝元先生的《人在海邦为俊杰，学从中华问渊源：乾隆23年琉球王国第四批派遣留学生北京学习生活调查》，刘丽川的《清末的韩、中〈外国教师合同〉比较研究》，张美兰的《掌握汉语的金钥匙：论明清时期国外汉语教材特点》，施正宇的《汉语教师戈鲲化出使哈佛初探》等论文从不同的方面展示了对外汉语教育史研究内容。

<sup>1</sup> 鲁健骥《对外汉语教学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课题——谈对外汉语教学历史的研究》，载《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第六次学术讨论会论文选》，华语出版社，1999年。

<sup>2</sup> 董明《古代汉语汉字对外传播史》，第639页，中国大百科出版社2002年。

第二、少数民族汉语教育史。中华文化的历史就是一个汉民族同其他少数民族文化不断融合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汉字的传播直接影响了中国境内少数民族文字的形成和发展<sup>3</sup>，而且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今天，都存在著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学习汉语，接受汉语教育的历史事实。从历史来说最突出的是满族入关后的汉语学习，他们留下了一系列的汉语学习文献，这对我们研究汉语教育史都是很珍贵的。从现实来看，目前正在行的少数民族的汉语教育，给我们提供了现实的材料。虽然，这不是对外汉语，当仍是将汉语作为目的语的教育，也同样是一种第二语言教学。<sup>4</sup>

第三、国外华文教育史。这是指在国外对华人后裔的汉语教育的历史。“有水井之处就有华人，有华人之处就有华教。”这说明华文教育历史的久远。华侨的汉语教育一般均是在双语背景下进行的，汉语也是作为目的语来学习的，也应作为汉语教育史的研究范围。郑良树三卷本的《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对华文教育史的研究提供了典型的范例。收入本次会议论文集中的菲律宾华教中心副主席黄端铭先生的《民族教育：菲律宾华教的社会定位》涉及到这一话题。

第四、国别汉语教育史。由本国政府主动派出进行的汉语教学的历史并不长，但汉语作为目的语学习的历史却有很长的历史，凡国外自主进行的汉语教育，并不能归为对外汉语教育。六角恒广的《日本中国语教育史研究》<sup>5</sup>和牛岛德次的《日本汉语语法研究史》就是这种研究的典范；收入本论文集的丁超的《罗马尼亚汉语教育的发展》，潘奇南的《二十世纪新越南成立后的汉语教育》，李明的《20世纪的瑞典汉语教育》，梁志桦的《新西兰的中文教育历史及其教学模式》，董淑慧的《保加利亚汉语教学史概论》，续三义的《日本汉语教学研究》都是从这个角度来研究的。

第五、中国语言学史。中国语言的发展与汉语作为目的语学习的过程紧密相连，对于这些把汉语作为目的语的学习文献研究的一个重要角度就是从中国语言学史的侧面加以把握。论文集中张卫东先生的《从〈老乞大〉六谚解本看近代汉语语音史》一文就是一个典范性论文。晚明传教士入华后的近代中国语言的发展又与传教士的汉语学习和研究有著密切地关系。传教士对中国语言的研究已经构成中国语言学史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只是在以往的中国语言史研究中很少注意这一部分而已。论文集所收入的杨慧玲的《世界上第一本汉英、英汉辞典的原创性：马礼逊的汉英、英汉辞典、〈康熙字典〉、和 Basilio de Glemona 汉拉字典的比较研究》，郝颖的《〈语言自迩集〉的记音系统及其记录的北京官话口语》，日本京都圣母院女子大学朱凤的《马礼逊〈華英字典〉<sup>6</sup>中的成语和谚语》，特别是日本内田先生的《〈马氏文通〉以前的中国人的语法研究》，沈国威先生的《理雅各的〈智环启蒙塾课初步〉与早期英语汉语教育》都是这方面代表性的论文。

第六、国外汉学史。从近代以来就有国外学者对中国语言进行较为系统地研究，这些研究在初期时有些是和他们学习汉语的历程同步进行的。对这一部分文献就应同时作为海外汉学研究的内容。实际上，

<sup>3</sup> 陆锡兴《汉字传播史》语文出版社 2002 年。

<sup>4</sup> “对少数民族来说，汉语虽然不是外国语，但它毕竟是一种非母语的外族语，少数民族使用自己的母语的习惯，同样也会对汉语的学习产生干扰甚至抗拒作用。”木哈白提·哈斯木《少数民族汉语教学中引进对外汉语教学成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载《语言教育问题研究论文集》，第 376 页，华语出版社 2001 年。

<sup>5</sup>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 年版。

<sup>6</sup> 该书收入吕必松主编《国外汉语研究丛书》中，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 年。

<sup>7</sup> 1815 年出版的马礼逊字典原名为《字典 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近年来，学术界均将该字典称为华英字典，1998 年日本出版的复刻本也将马礼逊的 3 部 6 册字典总称为《华英字典》。

如果做海外汉学史研究，忽略了这一部分，那也将是不完整的。<sup>8</sup>收入论文集中的柳若梅的《〈汉文启蒙〉与〈官话语法试编〉》和阎国栋、吴贺《瓦西里耶夫〈汉字解析〉初探》代表了这样的学术关注。

## 汉语教育史的研究方法

由于世界汉语教育史的研究物件包括六个方面，因而也有著多种的研究方法。笔者不做少数民族汉语教育史，因而这里仅从“对外汉语教育史”和“国外汉语教育史”及汉学史几个的角度来谈谈研究方法问题。我认为在方法论上以下三点较为重要：

第一、语言习得理论的研究方法。对外汉语教育史的研究只是对外汉语教育研究的一种历史延伸，对外汉语教学作为一种外语教学，其方法的特点和独特性同样适用于对外汉语教育史的研究。关于这点刘珣先生讲的很清楚，他说：“语言学的任务是研究语言，把语言的规律弄清楚，它的任务就完成了。语言教育学科则不能到此为止，它不是为研究语言而研究语言。因此，除了对汉语这一客体的研究外，本学科还需要研究教学活动的主体即学习，研究学习者汉语习得的过程和规律，以及学习者的生理、认知、感情等个体因素----这是第语言习得的研究。”<sup>9</sup>这里需要注意的目前在西方出版的第二语言习得的理论研究<sup>10</sup>，基本上建立在西方语言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实践基础上的，这些西方语言学家大多对汉语没有研究，因此，这样一种第二语言教学研究的理论是有局限性的，这点西方的语言学家也是承认的。<sup>11</sup>

这个事实告诉我们，在我们把第二语言习得的理论应用于汉语教育史研究时，要考虑到它的局限性。在这方面，对外汉语教育界尚未很明确看到。同时，正是几千年中国本土的对外汉语教学的历史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可以在这种历史的研究中总结出真正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普遍性规律，并从这中历史的研究中提升出更普遍的规律和理论，丰富一般的第二语言习得理论和外语教学理论。

## 第二、中国语言学史的研究方法。

任何语言的发展都是在与其他语言的相互接触中变化与发展的。王力先生早年明确作过论述，<sup>12</sup>这已经被中国语言发展的历史所证明。佛教传入中国后，不仅是对中国的宗教和思想产生了影响，对中国的语言也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sup>13</sup>基督教自明末传入中国以后，对中国社会和思想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同时在语言的影响也是很大的。近代以来，中国语言在语音、语法、词汇三个方面的变化都和基督教的传入有极的关系。从语音来说，现在我们的中文拼音系统的基础就是传教士所确立的。罗常

<sup>8</sup> 参阅张西平《西方人早期汉语学习史调查》，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3年。姚小平《西方早期汉语研究再认识，17—19世纪西方汉语研究史简述》，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21世纪的中国语言学（一）》，商务印书馆，2004年。许明龙《黄嘉略与早期法国汉学》，中华书局，2004年。

<sup>9</sup> 刘珣《谈加强对外汉语教学的教育学研究》，载《语言教育问题研究论文集》，第31页，华语教学出版社2001年。

<sup>10</sup> Vivian Cook《第二语言学习与教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年。

<sup>11</sup> 英国社会语言学家R.A.Hudson在《社会语言学》的中文序中说：“一件令人尴尬的事实是，（书中）一次也没提到中国，这一方面反映出我本人的无知，但同时也反映了中国没出现在我所读过的著作和论文这之中这一事实”。转引《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第六次学术讨论会论文选》，第130页，华语教学出版社。

<sup>12</sup> 《汉语史稿》中、下，中华书局1980年：1958年。

<sup>13</sup> 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中华书局，1963年；梁晓红《佛教词语的构造与汉语词汇的发展》，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年。

培先生早年的论文至今仍有很高的学术价值。<sup>14</sup>近年来杨福绵先生对利玛窦、罗明坚《葡华辞典》的研究，<sup>15</sup>张卫东先生对《语言自迩集》语音的研究都有突破性的进展。最近游汝杰先生所出版的《西洋传教士汉语方言学著作书目考述》<sup>16</sup>更是为我们展开一个广阔的学术空间。语法方面，姚小平先生最早对将《马氏文通》作为中国近代第一部语法书的观点提出批评，2003年在北京召开了《西洋汉语史研究国际讨论会》并出版了万济国的《华语官话》一书<sup>17</sup>。实际上万济国也并不是第一个写出中国语法的传教士<sup>18</sup>。对法国入华传教士马若瑟《中国文法》的研究已经开始<sup>19</sup>。辞汇方面，最有影响的是意大利汉学家马西尼所写的《现代汉语辞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一书，此书使我们对近代以来中国语言的形成历史有了一个新的看法。这方面日本关西大学的沈国威、内田先生等有一系列的研究成果。<sup>20</sup>这些都说明，在我们做汉语教育史时，其实已经进入了中国语言学史的研究领域。这样一个事实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对做中国语言学史的人来说，汉语教育史是其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的方面，特别是传教士汉语的研究，将会对中国语言学史的书写产生重大的影响，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仅仅局限于第二语言教学的方法，仅仅将这一领域的研究放在对外汉语教学的研究中，已经不能更好的推进其研究。我们应该从更大的学术视野，从整个中国语言学史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运用中国语言学史的研究方法来进行研究，才能将其学术价值更好显现出来。

第三、汉学史的研究方法。在中国语言从传统走向现代之时，在西方也正经历著一场“普遍语言学运动”<sup>21</sup>，从大的历史背景来说，是和地理大发现紧密相连的；从具体背景来说，入华传教士对中国语言的介绍在西方产生了影响。

欧洲文化界对中国语言的认识最早都是从入华传教士写的有关中国的书籍上看到的。据说中国方块字第一次出现在欧洲书籍中是在西班牙传教士门多萨的《中华帝国史》中，影响较大的是基歇尔(Kircher)的《中国图说》，他在这本书中首次公布了中国的一些象形的古文字，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兴趣。特别是他首次将《大秦景教碑》的碑文编成了拉汉对照词典，有发音、有词意，这恐怕是欧洲人学习汉语时的第一部拉汉词典。<sup>22</sup>

第一次把中国语言放入世界语言研究范围内的著作是英国人韦伯(John Webb)的《论中华帝国的语言可能是原始语言的历史性论文》(An Historical Essay Edeavouring a Probability that the Language of the Empire of China is the Primitive Language)。这本书在西方影响很大，虽然韦伯本人从未到过中国，但他通过阅读传教士的著作提出了这种惊人的观点。从中国语言学的角度来看这本书价值不大，但从西

<sup>14</sup> 国内学者在这方面大多局限在对《西儒耳目资》的研究上，实际上传教士所留下的大量语音文献至今尚未被系统研究。

<sup>15</sup> 杨福绵：《罗明坚、利玛窦‘葡汉辞典’所纪录的明代官话》，载《中国语言学报》，第5期，1995年6月。

<sup>16</sup> 遊汝杰著《西洋传教士汉语方言学著作书目考述》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sup>17</sup> 姚小平《〈汉文经纬〉与〈马氏文通〉——〈马氏文通〉历史功绩重议》，《当代语言学》1999年第2期。姚小平《现存最早的汉语语法著作——瓦罗著〈华语官话语法〉简介》，《中国语文》，2001年第5期。姚小平《西方早期汉语研究再认识，17—19世纪西方汉语研究史简述》，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21世纪的中国语言学（一）》，商务印书馆，2004年。国外已经开始注意这一研究领域，参阅Sandra Breitenbach, Leitfäden in der Missionarlinguistik, Frankfurt am Main 2004。

<sup>18</sup> 参阅白佐良(Giuliano Bertuccioli, 1923/2001)的《卫匡国的〈中国文法〉》一文，见德国《华裔学志》2003年51号629—640，感谢罗马三大的白华老师提供了此文的译文。

<sup>19</sup> 李真《马若瑟对中国语言学史的贡献》，西洋汉语研究国际研讨会论文，2003。

<sup>20</sup> 沈国威《近代日中语汇交流史》，笠间书院1994年。

<sup>21</sup> David E. Mungello, Curious Land: Jesuit Accommod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Sinology, P212, Stuttgart 1985.

<sup>22</sup> Athanasius Kircher, China Illustrata, Kathmandu Nepal, 1979.

欧洲思想文化史的演变而言此书倒有一定的地位，所以对西方人学习汉语，研究汉语具有重要意义。汉语教学史的研究不能仅仅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还应从比较文化和比较语言学的角度考虑，关于这一点下面在讲方法论时还会提到。

德国早期的汉学家米勒(Andreas Muller)是欧洲本土最早研究汉语的人之一，他在自己著名的 *Clavis Sinica* 一书中称他已找到了学习汉语的钥匙，可以很快地读懂汉语。这个消息一度曾使莱布尼茨十分动心，多次给他写信。<sup>23</sup> 在俄国的德国早期汉学家巴耶(T.S.Bayer, 1694～1738)也是最早学习汉语和研究汉语的人，他既研究了中国文学也研究了中文文法。<sup>24</sup>

1814年12月11日法国法兰西学院开设了汉学讲座，从此“传教士汉学”与“专业汉学”并存的时代开始了。“这个日子不仅对于法国汉学界，而且对于整个欧洲汉学界，都是有决定意义的。”<sup>25</sup> 从此，汉语、汉语语法及《大学》等都成为法兰西学院的正式课程。第一任汉学教授雷慕沙(Abel Remusat, 1788～1832)第一次讲中文文法时借助的是马若瑟的手稿，几年后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汉语教学著作《中华帝国通用的共同语言官话》，奠定了他在汉语教学中的地位，而《汉文启蒙》(*Elemens de la Grammaire chinoise*)很长一段时间内也成为法兰西学院的汉语教材。

德国汉学和汉语教学的奠基人是硕持(Wilhelm Schott, 1802～1889)。他于1833年在柏林开设中国语言文学课程，拉开了德国专业汉学的序幕。他于1826年所完成的博士论文是有关中国语言学的《中国语言的特点》(*De indole linguae Sinicae*)。<sup>26</sup> 他1857年在柏林出版的《可用于讲课、自学的汉语课本》(*Chinesische Sprachlehre, zum Gebrauche bei Vorlesungen und zur Selbsteunterweisung*)很长时间内是德国人学习汉语的教材。

俄国汉学和汉语教学的奠基人是雅金夫·比丘林，他在北京呆了14年之久，其间他努力学习汉语，并最早开始编纂辞典。1831年比丘林在恰克图所开办的汉语学校是俄罗斯汉语教学的历史上教学体系最为完备的学校，1838年他返回彼得堡后，又从事汉语教学和汉学研究30多年。“他的办学为俄国开办汉语学校提供了经验，所编《汉语语法》(1838年)长期被沿用，直到20世纪初仍是喀山大学和彼得堡大学东方系的教材。”<sup>27</sup>

英国的汉学和汉语教学则落后于法国和德国，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入华以后，英国的汉学和汉语教学有了长足的进步。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的英译中国典籍奠定了他在十九世纪西方汉学史上的地位。而翟理思(Herbert Allen Giles, 1845～1935)在继承威妥玛汉字罗马拼音法的基础上所创立的威—翟式拼音使他也在汉语研究上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美国的传统汉学的兴起是和基督教新教入华传教联系在一起的。按费正清的说法，它是“西方入侵的一部分”<sup>28</sup>，美国大学的第一个汉学系是由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 1812～1884)1876年从中国返回耶鲁大学后所创立的。“在卫三畏的主持下，建立了美国第一个汉语教学研究和东方学图书馆。

<sup>23</sup> David E. Mungello, *Curious Land: Jesuit Accommod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Sinology*, P212, Stuttgart 1985.

<sup>24</sup> Knud Lundbaek, T. S. Bayer(1694～1738)Pioneer Sinologist, Curzon Press.

<sup>25</sup> 戴仁主编，耿升译：《法国当代中国学》，第2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sup>26</sup> 张国刚《德国汉学研究》，中华书局，1994年；简涛：《柏林汉学的历史和现状》，《国际汉学》第4期，大象出版社，2000年。

<sup>27</sup> 李明演：《俄国汉学史提纲》，《汉学研究》第四集，第59页，中华书局，2000年。

<sup>28</sup> (美)费正清：《新教传教士著作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载《费正清集》，第241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

翌年，哈佛大学也设置汉语课程，并设立东方图书馆。”<sup>29</sup>

我在这里罗列这些历史的事实是想说明：如果我们做国别的汉语教育史，那实际也就进入了汉学研究的领域，不从这个角度把握，我们很难摸清各国汉语教育史的线索，所以汉学史的研究方法是不可少的。

## 结 论

第一、世界汉语教育史是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这一领域的开拓必将极大的拓宽了我们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研究范围，使学科有了深厚的历史根基，从而使我们在总结和提升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基本原理和规律时，不再仅仅的跟在西方第二语言教学的理论跑，而是从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悠久历史中总结、提升出真正属于汉语本身的规律。实际上，我们还可以在这一研究中为第二语言教学的理论和方法做出我们的贡献，将我们的历史经验提升为更为一般的理论，使其具有更大的普遍性。尽管这还是一个遥远的目标，但在学术上则是必须要确立的一种理念。第一届世界汉语教育史大会的召开，是我们向这个目标迈出的第一步，“世界汉语教育史学会”的成立，则表明了中国学者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决心。

第二、世界汉语教育史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涉及多学科，必须有多种方法的结合。我们在运用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方法时，一定要注意和中国语言学史的方法相结合。在一定的意义上，中国语言本体历史的研究和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和教育历史的研究是密不可分的。那种仅仅局限在课堂教学经验研究的方法，是其学识不足的表现；反之，那种无视甚至轻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和教育历史的观点，将无法揭示出中国近代以来语言变迁的真正原因。

同时，我们在这一研究中将会强烈地感到，中国语言的研究已经不在局限在中国本土，中国语言对国外语言发展和影响正是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的历史中产生的，这不仅表现在东亚一些国家的语言形成和发展之中，也表现在西方近代以来的语言变迁中。将汉学研究纳入我们的研究视野，将使我们在对中国语言的思考，我们对“对外汉语教学史”的研究放入了一个更为宽阔的学术空间。

[张西平 2005年1月23日写于德国爱尔兰根大学]

---

<sup>29</sup> 侯且岸：《当代的美国“显学”》第33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

# **第一部分**

## **嘉賓致辭和大會收到的賀辭**

# 澳門特區政府社會文化司司長

崔世安 博士

各位嘉賓，  
各位專家學者：

今天由澳門理工學院、北京外國語大學、北京語言大學聯合舉辦的“世界漢語教育史國際學術研討會及世界漢語教育史研究學會成立大會”開幕了，出席開幕式的有關心漢語教育事業的嘉賓以及專家學者。與會的專家學者有遠道而來的義大利、挪威、新西蘭、俄羅斯、日本、韓國、菲律賓等10個國家的朋友，也有來自內地、本澳的專家，共80多位。大家共聚一堂，圍繞世界漢語教育史等相關問題展開討論，這對於漢語教育界、史學界、中西文化研究界無疑是一件很值得慶賀的大事。請允許我代表特區政府向各位嘉賓、專家學者表示熱烈的歡迎。

眾所周知，近年來，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逐步提高和對外開放的不斷擴大，漢語在國際生活中的重要性日益顯現，全球範圍內學習漢語的人數激增，中國對外漢語教學的規模也在迅速擴大，有力地推動了漢語作為第二語言教育的不斷深入發展，而世界漢語教育史的進一步研究，無疑將拓展這一領域，使該學科有了更為深厚、更為紮實的歷史根基。

澳門是近代中國的對外窗口，是西方人自15世紀以來最早學習漢語的地方，也是最早將漢語教育列入大學課程的地方，澳門歷史上留下的有關漢語教育的豐富材料亟待我們開發和研究。因此，在澳門召開首屆會議，是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的。

在當代澳門，澳門特區政府和各界人士都十分關心普通話（漢語）的普及與推廣，並採取了一些措施。澳門理工學院是最早開設漢語（普通話）教學的高等學府，學院的前身之一——華務司技術學校早在20世紀80年代就開始了漢語（普通話）的培訓工作。理工學院建立後，又將此項工作列入重要議事日程，常抓不懈，大力開拓公務員漢語培訓，建設完善普通話學位課程，在國家語委、國家漢辦以及北京語言大學的大力協助下，理工學院建立了澳門第一個普通話水平測試（PSC）和漢語水平考試（HSK）中心，積極開展這兩項國家級考試，加快了這一事業的發展。

世界漢語教育史是一個涉及多學科的新領域，對其深入地研究，不僅會給國際漢語教育提供一個歷史的基礎和經驗，對近代漢語史的研究也會產生重大影響，同時，也將拓寬我們對各國漢學史的研究範疇。

為了推動國際漢語教學學科的發展，促進各國漢語教育史的研究，在這次會議上還將成立“世界漢語教育史研究學會”，以增進各國漢語教育領域同行之間的相互瞭解、交流與合作。

最後祝願此次研討會圓滿成功，預祝大家在澳門的生活愉快。

# 北京外國語大學

張西平 教授

各位來賓、各位朋友，  
大家好！

今天，在《世界漢語教育史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澳門理工學院勝利召開之際，我首先代表北京外國語大學校長陳乃芳教授向大會表示熱烈的祝賀，向大會的東道主澳門理工學院為籌備好這次會議所做的辛苦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謝！向來自世界各地的學者和漢學家們表示熱烈的歡迎和問候，並預祝研討會圓滿成功！

今天，這個由澳門理工學院、北京外國語大學海外漢學研究中心、北京語言大學聯合主辦的“世界漢語教育史國際學術研討會”具有重要學術意義。

首先，這次會議必將推動我國對外漢語教育史的研究。長期以來，在對外漢語教育領域內，學術研究基本上以教學法研究為中心，而缺乏關於學科史的研究。自從魯健驥先生首次提出這個問題後，對外漢語教育史研究開始引起學術界的重視，去年出版的國家漢辦首批科研項目的兩個成果《西方人早期漢語學習史調查》和《中國語言文字對外傳播史》標誌著漢語教育史的研究已經開始起步。任何一個學科的發展都必須有理論和歷史兩個方面為根基，對外漢語教學領域也不例外。

從歷史上看，自唐朝以來已有了比較系統的對外漢語教育，近處說，近代以來對西方人的漢語教育也有四百年的歷史。這期間留下了大量豐富的材料和文獻，對這些材料和文獻的研究不僅可以使我們理清對外漢語教學的歷史，而且對今天的對外漢語教學基本理論的研究也有著重要的意義，如漢語教學中是否要“字本位”的問題，我們就可以從對外漢語教學史的研究中得到重要的啟示。

其次，漢語教育史的研究必將加深對漢語史和漢語本體研究的理解。任何語言都是在文化的交流和語言的接觸中不斷發展和變化的，漢語也是如此。唐代正是在翻譯佛經的過程中，使反切的語音系統成熟，而近代以來入華傳教士和西方人的漢語學習對漢語本體研究也產生了重大的影響，羅常培先生的著名論文《入華耶穌會士對中國音韻學的貢獻》已為人所知，馬西尼、內田慶市、沈國威先生的研究則預示著西方人早期的漢語著作對近代詞語形成的影響，而1603年萬濟國的《華語官話語法》的翻譯出版，說明早在《馬氏文通》出版的近三百年前，西方人在學習漢語中已對漢語語法有了較深的研究。游汝傑先生在最近所編的《西洋傳教士漢語方言學著作書目考述》中認為傳教士在方言的研究上其水平遠遠高過清儒的乾嘉學派大師。對西方人，尤其是傳教士漢語的研究不過剛剛開始，我相信這一歷史的研究將對漢語本體的研究和中國語言學產生重要影響。

最後，漢語教育史的研究必將進一步推動海外漢學的研究。外國人漢學研究的第一步就是漢語學習，弄清海外各國漢語教育的歷史、人物、著作和機構，必將進一步加深我們對國外漢學史的研究。

所以，我認為今天這個會議的召開將對外漢語教學史、漢語史和漢語本體研究，海外漢學史研究等多個學術領域產生影響，而且這樣主題的學術會議在中國也是第一次，這預示著一個新的學術研究領域的展開。

在澳門召開這樣的會議就顯得意義尤為特殊，澳門是西方人最早學習漢語的地方，在這方面李向玉院長的《澳門聖保祿學院研究》一書有著全面而又詳細的論述，該書是國內學術界最早研究這一領域的著作之一。

我們北京外國語大學海外漢學研究中心近年來一直致力於對西方早期漢學的研究，在前輩學者提携關懷下，在眾多學者的幫助之下，我們做了一些工作。

今天能和澳門理工學院、北京語言大學一道召開這個會議我們感到十分榮幸，能和諸多前輩學者、海外內著名學者共同探討漢語教育史的問題感到十分高興。我預祝大會圓滿成功。

尊敬的李向玉院長：

您好！

欣聞貴院與北京外國語大學、北京語言大學共同主辦的“世界漢語教育史國際學術研討會暨世界漢語教育史研究學會成立大會”將於2004年7月1日-4日在澳門舉行，國家漢辦對此次國際研討會召開表示熱烈的祝賀。

漢語教育史是對外漢語教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重要組成部分。研究世界語教育史，對於以古鑑今、吸收借鑑漢語教育史上的經驗教訓、促進對外漢語教學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澳門是中西文化的匯聚交融之地，世界漢語教育史研究學會在澳門成立，必將在中西文化交流、漢學研究、對外漢語教學及相關學科的發展方面起到推動作用。

由於我7月份工作日程安排已滿，屆時無法赴澳門與會，對此深表歉意。在此，預祝本次國際研討會取得圓滿成功，並祝願世界漢語教育史研究學會各項工作蒸蒸日上。

國家對外漢語教學領導小組辦公室

主任 嚴美華

2004年5月25日

澳門理工學院李向玉院長並各位來賓及專家學者：

獲悉貴院同北京外國語大學、北京語言大學聯合召開《世界漢語教育史》國際學術研討會，並在會議期間成立《世界漢語教育史研究學會》，十分高興。

自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中國學術界開始重視對域外漢學的研究，很多相關學術著作被翻成中文出版，不少大學也成立了漢學研究所，其中以北京外國語大學海外漢學研究中心成績最為突出，該中心的《國際漢學》已成為這一學術領域中最有影響的刊物。這些都標誌著中國學術界視野的擴展，標誌著對中國文化的研究已經成為一項國際性的學術事業。

澳門是歷史上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是西方漢學的發源地，也是西方人最早學習漢語的地方，今天你們在澳門召開這樣的會議是很有意義的，顯示了你們的學術眼光。現在你們在漢學研究的基礎上，又深入到國外漢語教育史的側面進行研究，這說明對漢學的研究在進一步發展。

北京外國語大學海外漢學研究中心主任張西平教授很早就和我談到這個會議，並轉達了大會組委會邀請我出席開幕式的美意，但無奈現年事已高，行動頗為不便，不能前往澳門參加這次盛會，特寫信對大會表示祝賀，預祝大會圓滿成功，使漢學研究不斷發展。

任繼愈

2004年6月15日

# 世界漢語教育史國際學術研討會暨 世界漢語教育史學會成立大會

各位先生：

此次世界漢語教育史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澳門召開，世界漢語教育史學會將成立，這不僅是漢語教育及國際漢學研究的一大盛事，也是整個學術界一件值得紀念的弘舉。

自古代以來，漢語在亞洲地區即有廣泛影響，及至中西交通發達，文化溝通，外人學習漢語日益普遍，特別是在近年，漢語教育尤見昌盛，其發展歷史及所積之經驗，所逢遇之問題，極待闡發研究，相信在本次國際學術研討會上，預會各方面學者必有許多鴻文要論，對漢語教育史研究有重大貢獻，特別是澳門數百年來居中西文化交流津樑，人物輩出，底蘊豐厚，研究進展之前景，正不可限量。

日前承蒙本次國際學研討會諸先生盛情邀請，我本已準備前來學習請教，但適值擔一項大型科研任務，無法離開，竟有負雅意，謹在此致歉！今後學會有我能盡綿薄之處，即祈賜告是幸。

在此祝賀  
研討會圓滿成功  
學會興旺發達，取得豐碩成果

清華大學國際漢學研究所

李學勤 敬上

2004年7月1日